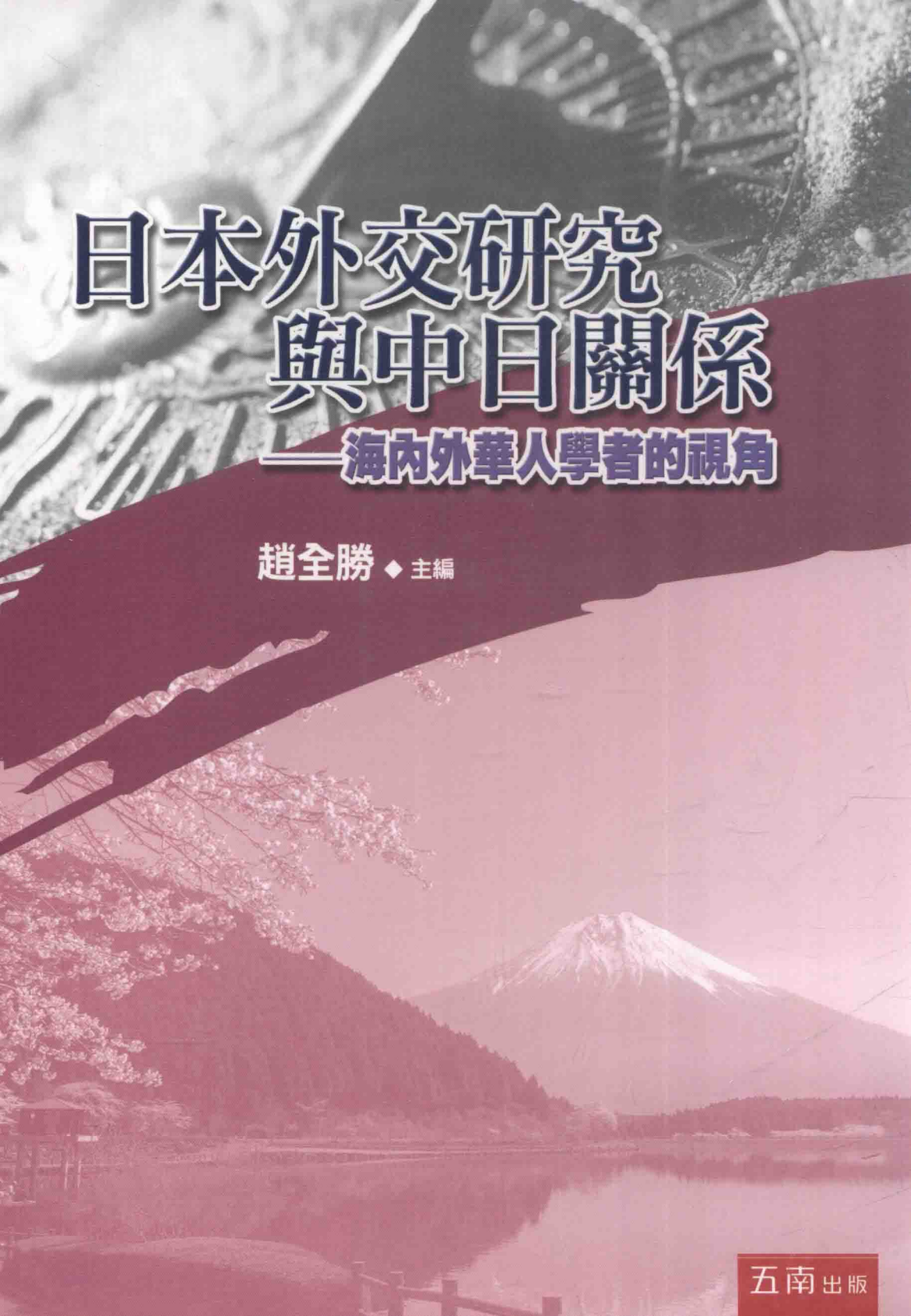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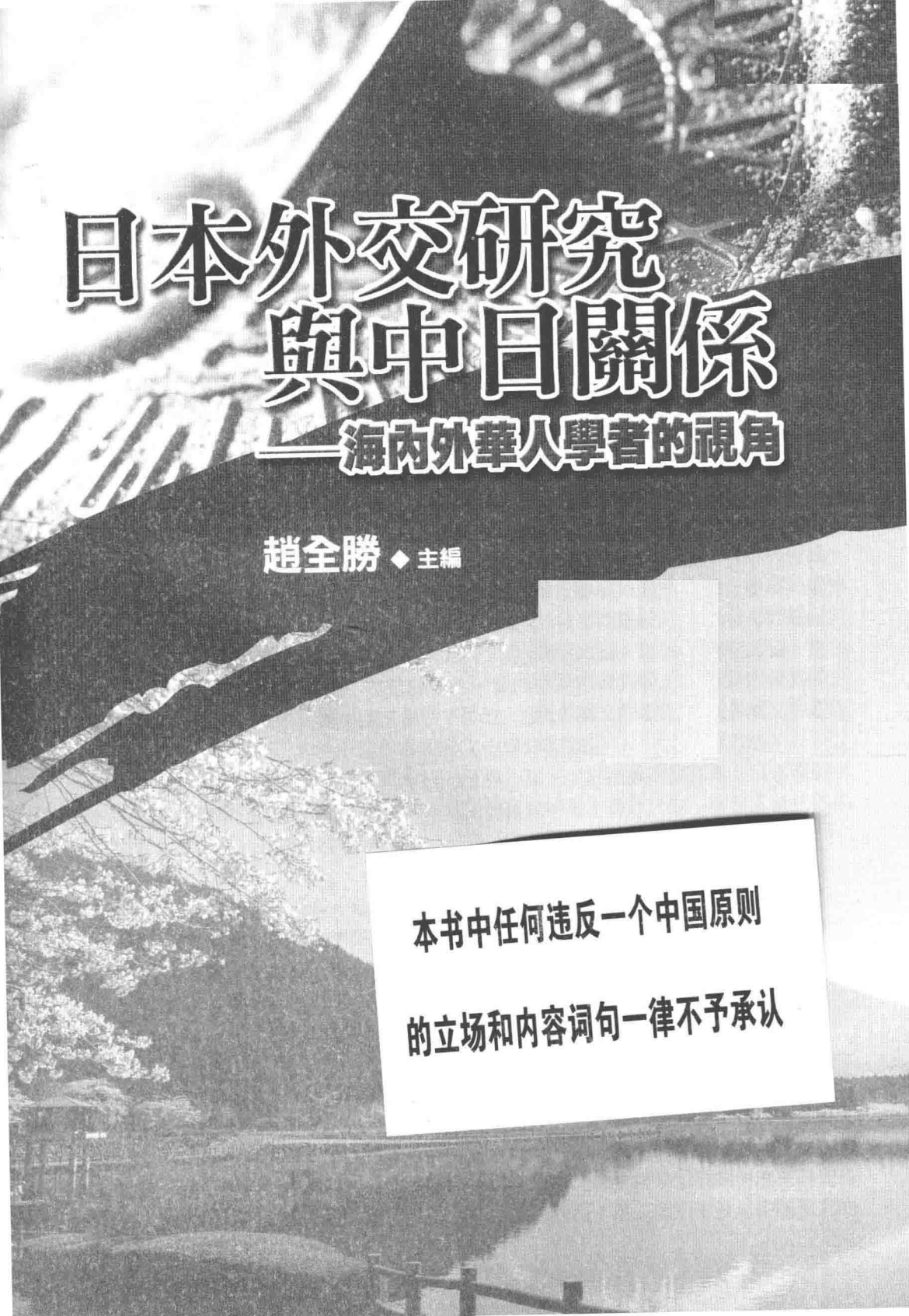


日本外交研究 與中日關係

——海內外華人學者的視角

趙全勝 ◆ 主編

五南出版



日本外交研究 與中日關係

——海內外華人學者的視角

趙全勝 ◆ 主編

本書中任何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的立場和內容詞句一律不予承認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日本外交研究與中日關係—海內外華人學者的
視角／趙全勝主編。——初版。——臺北市：
五南，2015.06

面：公分

ISBN 978-957-11-8085-4 (平裝)

1. 外交政策 2. 中日關係 3. 日本 4. 亞太地
區

578.313

104005316



1PAI

日本外交研究與中日關係—— 海內外華人學者的視角

主 編 — 趙全勝

作 者 — 趙全勝 李廷江 宋成有 吳奇南 庚 欣
苑崇利 劉岸偉 王建偉 劉江永 萬 明
湯重南 李恩民 陶德民 刑予青 杜 進
蔡東杰 江正殷 何思慎 王 鍵 李世暉
彭大進 宋鎮照 翁俊桔 蔡相偉 金永明
陳貞如 張啟雄

發行人 — 楊榮川

總編輯 — 王翠華

主 編 — 劉靜芬

責任編輯 — 張婉婷

封面設計 — P. Design視覺企劃

出版者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

電 話：(02)2705-5066 傳 真：(02)2706-6100

網 址：<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wunan@wunan.com.tw

劃撥帳號：01068953

戶 名：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駐區辦公室/台中市區中山路6號

電 話：(04)2223-0891 傳 真：(04)2223-3549

高雄市駐區辦公室/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90號

電 話：(07)2358-702 傳 真：(07)2350-236

法律顧問 林勝安律師事務所 林勝安律師

出版日期 2015年6月初版一刷

定 價 新臺幣550元

前言 從海內外華人學者的視角看日本外交

趙全勝

「十年磨一劍」，本書的出版是全球華人政治學家論壇（華人論壇）自2006年以來啟動的日本外交研究項目的一項重要成果。該論壇是由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澳門地區，以及在美國、日本、歐洲、大洋洲、東南亞地區的華人學者組成的。華人論壇除了每年召開各種形式的國際研討會外，還在北京參與相關國際問題的討論與政策對話。自日本研究項目啟動後，論壇於2006年12月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美利堅大學舉行了第一次有關日本外交的國際研討會。來自美國、日本和中國大陸的眾多學者齊聚一堂，對日本外交展開了熱烈討論。2008年7月，在日本東京的早稻田大學召開了第二次學術會議，同年8月又在北京清華大學舉行了一個小規模的工作會議。從2011年起華人論壇與遼寧社科院東亞研究中心合作，又連續三年在大連舉辦了包括臺灣學者在內的日本問題研討會。這些都為華人學者中的日本問題專家提供了絕佳的機會與環境進行學術討論，也為本書的寫作打下了紮實的基礎。本書論文的主要內容都是在這些學術活動中發表的。在過去幾年的編輯過程中，很多論文都做了修改；儘管此次出版不能把所有論文都重新一一進行修訂，但我們仍能從各位作者的論文中學到很多新的視角和分析方法。

如前所述，儘管這一研究課題僅僅邁出了第一步，但它在推動全球華人日本問題研究的學術網路聯繫和對日本外交的深入研究上的意義則是不容低估的。參與本書寫作的華人學者共有27位，分別來自中國大陸、臺灣、日本和美國，他們是：

中國大陸（7）：宋成有，湯重南，吳寄南，劉江永，王鍵，金永明，苑崇利

臺灣（8）：何思慎，張啓雄，蔡東杰，李世暉，陳貞如，宋鎮照*，翁俊桔，蔡相偉（*其中宋鎮照、翁俊桔、蔡相偉為同一篇論文的共著者）

日本（8）：李廷江，杜進，李恩民，陶德民，劉岸偉，庚欣，邢予青，江正殷

美國（4）：趙全勝，王建偉，萬明，彭大進

本書的特點是從海內外華人學者的視角來分析和研究日本外交。作為日本的主要鄰國，中國學術界，更不要說政界、經界，都對日本國內外發展的動向極其關注，在研究日本外交的領域裡也出現了不少重大的研究成果和可喜的成就。但是這裡面仍然存在著兩個問題。第一，如何提高研究日本外交的水準，以及從社會科學領域的角度來研究日本外交，對海內外的華人學者來說仍然是一個重要的課題。第二個問題就是中國學者的

聲音往往還很難走出國門，例如我們在日本經常聽到的有關「外國」對日本外交的研究成果往往來自西方學術界，也就是歐、美學術界。在國際學術界中，中國學者的分析經常被認為是中國政府的聲音，從而不甚受到重視。這也就是說，中國大陸和海外華人學者（包括在美國、日本和臺灣的學者）儘管都在各自領域裡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他們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是十分微弱的，而且相互之間的交流也還剛剛起步。為探索如何解決上面所提到的兩個問題，在過去的幾年裡我們把在中國大陸、臺灣、美國和日本受過系統學術訓練的華人學者聚集在一起，分別在華盛頓、東京、北京與大連舉行了幾次國際學術研討會和工作會議，從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角度對日本外交進行深入的分析。這樣的一個研究成果將為國際社會認識日本外交及其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一個新的視角，同時也幫助我們更全面地瞭解全球華人社會對日本的認識，以及中日關係今後的發展提供新的研究成果。因此我們可以說，這個項目本身對學術問題的深入研究以及對學術網絡的推動都具有重大意義。

擺在我們面前這本書的另一個突出的特點是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也就是說，它既有從國際關係理論出發所做出的分析與闡發，又有對日本外交各個方面的具體問題和對中日關係的實證考察。本書由五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對日本外交研究作出一個系統的概論；第二部分詳細考查了日本對大陸外交和中日關係的發展；第三部分集中闡述的是臺日關係；第四部分則專門研究了日本在亞太地區的政策與發展；第五部分是近年來大家所關注的釣魚臺之爭和海洋權益問題。

我們在這裡除了對來自日本、美國、中國大陸和臺灣的每一位作者表示誠摯的謝意外，也要對美利堅大學、早稻田大學（特別是劉傑教授）和清華大學（特別是李廷江教授和劉江永教授）在前期對本項目所提供的支援表示感謝。還要特別對遼寧社科院東亞研究中心（特別是中心主任宋成有教授）表示感謝，該中心自2011年起連續三年在大連主辦了有兩岸學者共同參加的研討會。這些活動都為本書論文的收集奠定了紮實的基礎。同時，也要對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的劉靜芬副總編輯和相關工作人員致以誠摯的謝意；並對在聯繫出版的過程中給予幫助的鄧中堅、何思慎兩位教授致謝。

我們在華盛頓、東京、北京和大連就此課題研究舉辦的學術活動期間經常聽到來自各方學者的呼聲，希望透過這一專案所建立的學術網路能夠繼續發揚光大，以對日本研究以至於亞太國際關係做出應有的貢獻。本書的出版也是對這一呼聲的響應吧。我還想特別指出的是在本書的成書過程中，我們每一位華人學者都與日本學者有著不同形式和程度的交流，並獲益匪淺。沒有以上所提到的來自各方的幫助與交流，這本書的出版是無法完成的。作為在日本外交研究方面所邁出的小小的一步，我們相信這一項目今後的持續進行將對推動中日美之間的相互瞭解，以及國際日本學的發展繼續做出貢獻。

趙全勝

2014年11月21日改於華盛頓

目錄

CONTENTS

前言 趙全勝

第一部分：日本外交研究

第一章	日本外交的主流思維：「帶傾向性的中間路線」（趙全勝）	3
第二章	20年來中國的日本外交研究（1985-2005）（李廷江）	21
第三章	歷史認識聚焦鏡下的日本政府——兼評安倍內閣的歷史認識（宋成有）	45
第四章	日本智囊團的沿革及其在外交決策中的作用（吳寄南）	61
第五章	日本社會經濟面臨的總危機及其走向——兼議日本經濟與外交政策的互動及走向（庾欣）	73
第六章	石橋湛山的外交思想研究——「功利」外交論及其日中美蘇和平同盟構想剖析（苑崇利）	85
第七章	新渡戶稻造與日本的文化外交（劉岸偉）	99
第八章	日本能成為遠東的「英國」嗎？——布希政府時期的日美關係（王建偉）	113

第二部分：日本對大陸外交和中日關係

第九章	日本政治思潮變化與中日關係（劉江永）	135
第十章	新世紀的日中關係（萬明）	153
第十一章	安倍政權對華外交與中日關係及其思考（湯重南）	173
第十二章	日本外交的兩把利劍：聯合國中心主義與非政府外交——以一個中國政策及臺灣問題為中心（李恩民）	187
第十三章	近代日本的對華態度的變遷——關於所謂「監護人」意識的形成（陶德民）	211
第十四章	從日本在華投資和雙邊貿易考察中日經濟關係（邢予青）	223
第十五章	日本經濟外交與對華政策的轉變——關於終止對華ODA決策過程的分析（杜進）	239

第三部分：臺日關係研究

第十六章	後冷戰時期臺日特殊關係發展分析（蔡東杰）	257
第十七章	冷戰後日臺關係變遷及研究（江正殷）	273
第十八章	後ECFA時期臺日關係發展（何思慎）	291
第十九章	「日臺漁業協議」對釣魚臺問題的影響（劉江永）	297
第二十章	李登輝執政時期的日臺關係與兩岸關係（宋成有）	307
第二十一章	對近年來日臺關係走向的歸納與預測（王鍵）	321

第四部分：日本外交與亞太區域發展

第二十二章	安倍內閣的對外政策及其對亞太局勢之意涵（何思慎）	333
第二十三章	經濟安全保障思維下的TPP：安倍政權的困境與挑戰（李世暉）	341
第二十四章	日本在東亞經濟和經濟一體化中的作用（彭大進）	355
第二十五章	日本與東協國家在「南海問題」的合作（何思慎）	377
第二十六章	日本安倍晉三政府的亞太區域政經發展策略研析：安全／ 發展vs.政治／經濟之雙重應用（宋鎮照、翁俊桔、蔡相偉）	389

第五部分：釣魚臺之爭與海洋權益問題研究

第二十七章	中日圍繞釣魚臺爭議與安全保障（劉江永）	417
第二十八章	兩岸釣魚臺列嶼周邊海域執法合作機制研究（金永明）	431
第二十九章	國際合作原則於海洋法制之展現——兼論南海爭端與 發展（陳貞如）	451
第三十章	略論中國南海九段線的法律地位及屬性（金永明）	465
第三十一章	兩岸合作維護海權，共同開發海洋資源（王鍵）	473
第三十二章	建立「東亞航線共同體」重構海權發展戰略——中國沿海 屬島領土紛爭的解決之道（張啓雄）	483

第一部分

日本外交研究

第 1 章 日本外交的主流思維：「帶傾向性的中間路線」*

趙全勝

有關日本外交的研究自二次大戰以來可以說是汗牛充棟，特別是日本學術界以及西方學術界對於日本外交都十分關注。這是因為日本作為一個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三個軸心國之一的世界強國，在遭到毀滅性的打擊之後很快又重新崛起，成為世界上數一數二的經濟大國。以至於美國哈佛大學的亞洲問題專家傅高義在70年代末即驚呼：「日本名列第一」^[1]。也就是說，美國的國際問題專家在當時就已認定日本已經或即將成為世界的領先大國。在80年代出現的「敲打日本」（Japan Bashing）的熱潮中更是把日本當作繼蘇聯之後、又一挑戰美國全球霸主地位的挑戰者。自那時以來，歐美國家對日本內政外交的研究持續升溫，而日本學也由一個不為人注意的小學科一躍而成為備受矚目的顯學。

作為日本的主要鄰國，中國學術界，更不要說政界、經界，都對日本的動向極其關注。但是，如何提高研究日本外交的水準，以及從社會科學領域的角度來研究日本外交，對海內外的中國學者仍然是一個重要的課題。也就是說日本所聽到的外國對日本外交的研究成果主要來自西方學術界，也就是歐、美學術界。中國學者的聲音，在日本往往並不容易聽到。而在日本學術界中，中國學術界的分析往往被認為是中國政府的聲音，從而不甚受到重視。這一次的出書發表會和分別在華盛頓與東京舉行的國際會議將在美、日、和中國受過系統學術訓練的學者聚集在一起，從科學、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角度對日本外交進行徹底的分析。這將為國際社會認識日本外交以及政治、經濟、社會發展都提供一個新的視野，同時也為我們更加地瞭解中國方面對日本的認識和中日關係今後的發展提供新的資訊。因此我們可以說，這個活動本身就具有重大學術以及實踐意義。

我在20多年前曾在日本東京大學進行了為期一年的實地考察研究，在此基礎上，完成了有關日本外交政策制定過程和中日關係的研究專題^[2]。從那以後，我一直關注著日

* 本論文的最初版本發表於《日本學刊》2009年第一期（16-27頁），並於第二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所設立的「岡谷三喜男日本研究最佳論文」一等獎。

¹ 見 Ezra Vogel, *Japan as Number One*,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9.

² 所出版的專著有英文、日文、中文三個版本。這一專著的英文版本為：Quansheng Zhao, *Japanese Policymaking: The Politics Behind Politics*. New York and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raeger, 1993。中文版本為：趙全勝，《日本政治背後的政治》，商務印書館，1996年。日文版本為：趙全勝『日中間係と日本の政治』（杜進、枅内精子訳），岩波書店，1999年。

本外交政策的演變與發展方向。本篇論文的著重點在於對日本外交的主流思維進行分析，並提出「帶傾向性的中間路線」這一概念。在以後的部分將對這一概念和具體案例進行詳細的闡述。

第一節 中心議題和理論基礎

爲了更理解日本外交的發展方向，我們有必要把考察的重點放在日本政治外交界的主流思維上。作爲一個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發展起來的民主多元國家，日本各界對外交政策有不同的意見和傾向性，是非常自然的。但是如果簡單的把不同的意見排列出來，則無法得到其真諦。所以，這篇論文強調的是主流思維。所謂主流思維指的是日本政經學界和官僚體系，透過較長時間的思想激盪而就其外交政策所達成的一定程度上的共識。這種共識只是反映了相對多數人的意見，而這種相對多數也是在不斷變動中的。

談到對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分析，就不能不注意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基本概念。大家耳熟能詳的現實主義理論集中強調的是國家的實力和國家的根本利益^[3]。外交政策的最高領導最注意的是如何保持這個國家的興旺與政權的鞏固。所謂高政治化和低政治化之說，也就是一個國家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上，其軍事政治外交往往高於其他因素，包括經濟文化方面的考量。在這個意義上而言，各國之間軍事政治實力的增長與削弱，對本國國家利益優先順位的相對變動都會對這一國家的外交政策走向造成重大影響。所以說，現實主義是以一個國家的國家實力和根本利益爲考量的。其他因素，例如意識形態因素都處於相對次要的地位。

而自由主義學派，特別是最近興起的全球化的研究，則把注意的重點放在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依存，特別是大國之間在經濟貿易領域由於相互依存的加強而帶來的合作與妥協^[4]。在這個意義上講，世界舞臺上的國際組織，以及區域性出現的一系列共同體建設的國際機構與組織，都對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以及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走向產生了巨大的作用。

最近一個時期所廣爲流行的建構主義理論則把注意的重點放在國家政權和政策制定者對國際形勢、地區和世界格局發展的感受所引發的外交政策的變化^[5]。一個國家及其政策制定者對本國、本地區歷史的認知、所處地位的感受，都是這個國家在制定外交政

³ 有關這一學派的主要理論著述見：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s*,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把這一理論用於外交政策研究的重要代表作的例子有：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⁴ 見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7.

⁵ 有關這一學派的代表作包括：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策時候的重要考量依據。自由主義學派和建構主義理論所強調的都是國家實力與利益之外的因素。在這個意義上，它們常常也被劃分為統稱理想主義的這一學派。

毋庸置疑，國際關係和外交政策分析理論中還有眾多的學派可以用來分析日本外交政策的走向。以上所舉的只是幾個主要的理論學派。另外衍生出來的學派，例如：權力轉移理論、利益集團理論、決策者與內外環境互動理論等等，都是十分有用的理論框架。最近以來，不少學者已經開始試圖從國際關係理論的視野來分析亞太地區的國際關係^[6]。我們在下文對日本外交的主流思維進行分析時，將在不同程度上對這些理論有所應用。

第二節 歷史回顧

近現代日本外交自明治維新以來曾經三次面臨十字路口，需要做出重大方向性的政策選擇。我們所說的第一次十字路口是發生在十九世紀中葉。當中國的清朝受到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時，作為中國長期以來的學生，日本是非常注意這一次如費正清所說的「中西方文明的大衝突」。當中國在鴉片戰爭中被打敗，並於1842年簽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以及隨之而來的接二連三被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如法、德、俄所入侵，割地賠款，喪權辱國。這一切都使日本的統治者、上層階級和知識份子提出了一個重大問題：日本應該如何從中國接受教訓？其外交政策應該向何處去？是繼續堅持和中國一樣的閉關鎖國和排外政策，還是洗心革面走一條不同的道路？這也就是1868年日本實行明治維新，對其內政外交進行重大改革的重要背景。

日本的明治維新直接導致了日本工業化的迅速實現，國力的大幅度增強，及國際地位的迅速崛起。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日本接連打敗了兩個大國，也就是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戰爭中打敗了大清帝國，又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戰勝了俄羅斯帝國，使日本從一個遠處東海的彈丸之地一舉成為名揚四海的「日本帝國」。日本政治、經濟、社會都在這一時期經歷了脫胎換骨的重大變化，使日本從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封閉性封建國家走向以工業化為導向的經濟軍事強國。所有這些都使日本的統治者自我膨脹，進一步接受了西方殖民主義者弱肉強食的帝國主義邏輯。日本則從20世紀上半期走向軍國主義道路，殖民朝鮮半島，入侵中國東北，建立滿洲國，以至參加德、義、日三

⁶ 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例子看到這方面所做的努力：G. 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Stephan Haggard, "The Balance of Power, Globalization, and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Northeast Asi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 4 2004, pp. 1-38.

國軸心，發動和積極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南下東南亞，奇襲珍珠港，使「日本帝國」的版圖擴大到日本有史以來的最大範圍^[7]。然而，耀眼的勝利也預告著慘痛的失敗。在中國、朝鮮和其他亞洲各國人民所發動的反侵略戰爭中，日本受到了極大的打擊。美國反攻太平洋諸島，轟炸日本本土，在廣島和長崎投擲原子彈。蘇聯紅軍挺進中國東北，擊潰日本關東軍。這一切都給日本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最終導致日本於1945年8月宣佈投降，接受美軍占領。

日本在二次大戰結束時的慘敗，使日本面臨著其近現代史上第二次決定性的選擇。日本的內政外交動向何處去？日本如何從戰爭的廢墟中發展起來，重新返回國際社會？這些都是日本所需要解決的關鍵性問題。在美軍占領當局的領導下，日本於1947年通過了第二套憲法，從此走向了以和平發展為主軸的道路^[8]。戰後不到二十年，日本就進入了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成為亞洲經濟奇蹟起飛的領頭羊。日本經濟超過了歐洲諸強，直逼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從1990年代開始，隨著前蘇聯的解體，以及全球化地區主義趨勢的不斷加強，日本也經歷了一系列的變化。從1990年代初到本世紀初，日本經濟陷入了一個「失去的十年」的困境，1997年的亞洲經濟危機更使日本經濟雪上加霜。從80年代初開始的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也就是中國崛起，更給日本上下帶來了全方位的巨大衝擊。從90年代開始出現的北韓核武危機更觸動了日本內政外交的神經。隨著這一系列重大國內外政治經濟情況的發展，日本朝野上下也出現了新一波的民族主義高漲，以及政治保守化傾向的進一步加深^[9]。日本政界以及政治領導人也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以小泉純一郎為代表的重大社會政治變革^[10]。這一切都把日本外交推向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11]，促使日本的決策者、政治家、和知識份子在本世紀初展開了一場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作出符合日本國情和國家利益的政策大辯論^[12]。

我們可以看到日本在其一百多年近現代史上的外交政策選擇中，經歷了三次重大的十字路口。每一次的政策抉擇不但對日本生命攸關，而且也對亞洲，以至全世界都有重大的影響。而這些政策選擇又無一不與在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影響下的主流思維緊密相連。在前兩次歷史關頭的選擇中，日本都在國內外的巨大壓力下做出了具有轉折意義的重大選擇。例如，在明治維新時期，選擇了脫亞入歐的道路，也就是說日本脫離了「落

⁷ 有關日本侵華，特別是南京大屠殺，可參看：Joshua Fogel, ed.,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和 Iris Chang,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Basic Books, 1997.

⁸ John Dower, *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Norton, 1999.

⁹ Eugene Matthews, "Japan's New Nationalism," *Foreign Affairs*, Vol. 68, 2003, pp. 158-172.

¹⁰ Kent Calder, "Halfway to Hegemony: Japan's Tortured Trajectory,"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 27, No. 3, Fall 2005, pp. 46-49.

¹¹ Glenn Hook, et al., *Japa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nd Edition). Routledge, 2005.

¹² Yutaka Kawashima,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at the Crossroads: Challenges and Option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s Press, 2003.

後的，貧窮的，和分裂的東亞」，透過「富國強兵」的方法而加入歐美強國之列。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美國占領下，日本實現了帶有歷史性的轉變，也就是從一個軍國主義的，專制的政體向一個民主多元的，以和平為主的新型政治轉變。

第三節 「帶傾向性的中間路線」

在21世紀初，日本朝野基本上達成共識，完成了從後冷戰時期開始就著手醞釀的外交方向的第三次重大政策的選擇。與前兩次的不同之處就是日本無需選擇帶有與過去決裂性質的轉變，而選擇了一條頗具玩味的「中間路線」。筆者在2005年5月有機會參加了安倍晉三在訪問美國時舉行的一次午餐演講會。這也是為他一年多以後就任日本首相所進行的熱身活動之一。在本次午餐會上，我向安倍提出日本在當時的一段時間內加強了與美國的關係，而與中韓關係有所惡化，那麼日本外交是否仍然受到脫亞入歐思想的影響。安倍回答說，日本同美國的關係和與中韓之間的關係是互為補充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13]。安倍的這個思想典型的反應出日本這一輪政策選擇的新趨勢是避開兩個不同的極端方向，而向中間靠近，也就是所謂的「走中庸之道」。安倍上任一個月之後，美國紐約時報也發表評論指出，他的外交路線是走「中間路線」^[14]。而在2007年秋天登上日本首相寶座的福田康夫就是一個典型的走中間路線的穩健政治家。也就是說，除了少數人仍然選擇極端路線外，多數精英人士選擇的是中間路線。但即便如此，不同的政治家在不同的時期還是可以有不同的傾向性。而這種傾向性又往往是我們瞭解這一時期日本外交發展方向的關鍵因素。這就是本文所強調的日本外交以「帶有傾向性的中間路線」為主流的思辨方式。下文將就日本外交的帶傾向性的中間路線這一命題的具體表現逐一進行分析。

壹、中間路線一：「脫亞入歐」與「亞洲一體」

在日本兩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作為中華文明的熱心弟子，日本東亞社會一員的身分一直是很清楚的。而這一身分的認同在十九世紀中葉，日本社會發生重大變革時期而受到了帶有根本性的挑戰。當時的日本知識份子領導人，也就是後來建立了慶應大學的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提出了「脫亞入歐」的口號。福澤認為，日本應該脫離當初處於落後狀態的中國及其他亞洲社會，而盡最大的努力按照歐洲國家的模式成為現代社會的一

¹³ Shinzo Abe, Miles to Go: My Vision for Japan's Future, <http://www.brookings.edu/events/2005/0502japan.aspx>

¹⁴ 〈美報：強硬安倍上任一月轉向中間路線〉，新華網2006年10月31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10/31/content_5269631.htm

員^[15]。在日本國內應該進行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改革，加速日本的現代化，在國際社會上，日本應該與歐美先進國家結盟，成為強國中的一員。

與福澤諭吉同時代的日本思想家岡倉天心儘管也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卻在其對外關係的思想中提出了與福澤截然不同的口號。他在《東洋的覺醒》一文中提出了「亞洲一體」的政策建議，對西方白人社會對東方的入侵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強調了東亞社會團結一體抗拒西方入侵的重要性^[16]。當然，岡倉天心的「亞洲一體」的想法與我們今天東亞共同體的想法有著很大的區別，但它畢竟代表了日本知識份子在那時對日本在國際社會中身分的認同有著一種不同的思路。

由於日本國內外形勢的急劇變化和清朝政府對外政策的一系列慘敗，使福澤諭吉的學派在日本政學界逐漸占據了上風。隨著「脫亞入歐」思想的深入人心，日本社會中尊重與熱愛中國文化的思想潮流被輕視與厭惡亞洲社會的心態所取代。從這個意義上發展出「既然西方列強能夠對包括亞洲在內的開發中國家進行殖民侵略，為什麼日本不能？」的心態。這種心態直接導致了日本走向殖民朝鮮、占領中國、入侵東南亞的一系列侵略行徑。沿著這一思路走下去的日本在亞太地區的擴張政策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才告終結。

如前所述，1945年日本戰敗使日本面臨著其當代史上的第二次重大選擇。實際上，日本經歷了長達七年的美軍占領期，使日本不可能獨立地進行政策抉擇，而只能接受美國的領導，參加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由於國際大環境使然，也更加確認了日本沿著「脫亞入歐」方向發展的外交政策。1952年簽訂的舊金山合約以及隨之而生效的日美安保條約都使日本成為冷戰時期西方陣營的堅定一員^[17]。日本社會高度西化（也就是美國化）的趨勢自二戰結束以來一直是日本社會發展的主線。

二戰之後的年代裡，隨著亞洲經濟的復甦與高速發展，帶來了20世紀中後期的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從而使日本認識到亞洲對其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而這一認識又被中國連續二、三十年的經濟高速發展和冷戰後東亞經濟共同體的啟動（例如東盟加三〔中、日、韓〕）所加強。日本在位首相不止一次地宣稱：「『脫亞入歐』已經不完全是日本所應該採取的政策選擇。日本既是東亞社會的一員，又是西方先進工業化國家的一員。」但是在實際運作上，特別是在需要做出重大政策抉擇的關鍵時刻，日本決策者的籌碼更經常的是向歐美方向傾斜。例如，在小泉首相任期的後半期，當他被問到日本與中、韓關係惡化的對策的時候，他的回答是：「只要跟美國搞好關係，對中、韓也就自然會改善。」其重歐美，輕東亞的心態在此表露無遺。當然，在日本社會中要求領導人正確處理對中、韓等亞洲國家關係的呼聲在一段時間裡不斷高漲，特別是企業界更是

¹⁵ 福澤諭吉，《西洋事情》，慶應義塾出版局，2002年；『文明論之概略』，福澤諭吉，1875年。

¹⁶ 岡倉天心，《東洋の覺醒》，聖文閣，1940年。

¹⁷ Victor Cha, *Alignment Despite Antagonism: The US-Korea-Japan Security Triangl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Walter LaFeber, *Clash: U.S.-Japan Relations throughout History*. W.W. Norton, 1997.

擔心日本在亞洲的經濟地位有可能被逐漸削弱而敦促其領導人「回歸亞洲」。^[18]這也是2006年10月初，安倍晉三當選日本首相後首次的外交出訪國家便是中國和韓國的主要原因之一。安倍之後的福田康夫加強與中韓之間的合作關係等一系列做法，也是這方面的明證。由此可見，日本外交在以日美同盟為基礎的方針下與處理好與其他亞洲國家關係的中間路線的選項仍將繼續下去。

貳、中間路線二：和平與軍備

日本國家發展道路的方向在明治維新時期就經歷了重大的政策辯論。當時日本知識界與領導層所達成的共識是「富國強兵」。也就是說為實現「脫亞入歐」的目標，日本需要在實現其工業化的同時，也要成為一個軍事大國。在這個意義上而言，經濟與軍事發展是並重的。從19世紀後半期開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軍事發展目標更加成為日本外交的優先考慮。由於二戰的慘痛失敗，在美軍的領導下，日本朝野痛定思痛，通過了1947年以和平憲法著稱的新憲法。憲法第九條正式放棄日本的除自衛以外的軍事能力，奠定了日本在半個多世紀以來得以和平發展的基礎。美軍占領結束後隨即簽訂的日美安保條約為日本提供了保護傘，所以儘管在冷戰時期日本面臨著前蘇聯的安全威脅，日本仍然可以專心致力地發展經濟，而把它的軍事預算控制在1%上下。這也就是後來世人所周知的「搭順風車」（free ride）的經濟發展戰略。這也奠定了日本半個多世紀以來以經濟發展優先為特點的內政外交的指導方針。^[19]

隨著日本國力的不斷增強，日本社會出現了要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也提升它的軍事地位的呼聲而稱為軍事大國。^[20]日本著名政治家小澤一郎所提出的「普通國家」的概念即是這一思潮的代表。^[21]大家記憶猶新的是在老布希任職期間發動的美國第一次對伊拉克的戰爭，日本提供了巨大的經濟贊助，但是在伊戰後，科威特政府在《紐約時報》上所發表的感謝信上只對十幾個出兵國家表示感謝，日本的名字根本沒有提及，這被認為是日本「支票外交」的重大失敗。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日本國內出現了一種修改憲法、改變憲法第九條的思潮。不少學者和政治家開始為國防軍備升格製造輿論，進而把「防衛廳」改為「國防省」。隨著「中國威脅論」在日本的廣為流行和90年代開始的朝核危機以及後來的高潮迭起，都對日本國內加強軍備的思潮起了推動作用。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日本社會中堅持和平發展，反對加強軍事裝備，成為軍事大國的社會力量還是十分強大的。日本朝野都有為數眾多的政治家與學者反對修改憲法，

¹⁸ 有關日本財界早期與中國的交流，參看李廷江，『日本財界と近代中國—辛亥革命を中心に』，御茶の水書房，2003年。

¹⁹ Eric Heginbotham and Richard Samuels, "Mercantile Realism and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4, Spring 1998, pp. 171-203.

²⁰ 胡榮忠，〈日本軍事大國化的新動向〉，《日本學刊》2004年第5期，頁24-38。

²¹ Takashi Inoguchi and Paul Bacon, "Japan's Emerging Role as a 'Global Ordinary Pow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6, No. 1, 2006, pp. 1-21.

特別是憲法第九條。他們認為，日本堅持優先發展經濟，避免成為軍事大國的戰略是成功的，日本的和平憲法在世界上也是獨特的，對維護世界和平已經做出了重大貢獻。所以，日本不應該重走軍事大國的道路。

關於日本在和平與軍備發展不同外交方向的爭論中，國際輿論也是有不同看法的。美國的主流政治家希望日本能夠成為一個負責任的「正常國家」，而在國際事務中，特別是國際安全事務中作出重大貢獻。^[22]他們認為，日本戰後的發展已經為其和平道路奠定了紮實的基礎，所以日本不可能再次發動侵略戰爭，對其他國家造成安全威脅。^[23]對這一問題，中國、韓國、朝鮮，和受過日本侵略的東南亞國家則持有不同看法。他們認為，日本應該在修憲問題上持慎重態度，特別是憲法第九條。日本應該堅持其和平發展的道路，對過去歷史中所犯下的侵略罪行進行深刻地反省，以避免重走軍國主義的老路。在這個意義上，日本所面對的不光是其自身所面臨的兩難選擇，而且也面臨著來自美國和亞洲的兩種不同聲音。在這樣的國內外大環境下，日本中間路線的選擇已是必然的。但是在每一個具體的政策上，例如修憲問題等等，不同的政治領導人則會有不同的政策傾向性。而相關政策是否發生重大轉變也取決於該時期的主流思維向某一特定方向傾向的程度。

參、中間路線三：經濟優先與「政治大國」

日本外交自二戰結束以來的第一個指導方針就是所謂的「吉田主義」。當時的日本首相吉田茂提出了優先發展經濟的國策。如上一節所講到的，日本修改了其明治維新以來所強調的「富國強兵」這一建國方針，以強調「富國」為首要目標，而在「強兵」這個問題上則依賴於美國的核保護傘。也就是說，只要日美安保條約保證了日本的國家安全，日本就不需要把大量的財力用於國家安全方面，而只需保持一個小而精的自衛隊力量就可以了^[24]。多年以來，日本長期把其軍事開支維持在國民經濟收入的百分之一就足以維持其國防的需要，而集全國上下的力量努力發展經濟，使日本迅速超過了英、法、德等歐洲大國。日本早在1970年代就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主體。

日本經濟大國的地位還被其在海外活躍的經濟活動所不斷加強。日本在美國的大量投資與收購，再加上日美兩國間此起彼落的經濟貿易磨擦，都使日本的實力得到世界的承認，而有力地提高了日本的大國地位。應該值得強調的是，日本在海外開發援助的問題上也逐漸超越歐美。早在1980年代，日本已成為對第三世界開發中國家提供最多援助的國家。這一領先地位直到1990年代後期日本處於經濟不景氣的時期才又被美國超

²² Gilbert Rozman, "Japan's Quest for Great Power Identity," *Orbis*, Winter 2002, pp. 73-91.

²³ Michael Green, "Understanding Japan's Relations in Northeast Asia," Testimony for the Hearing on "Japan's Tense Relations with Her Neighbors: Back to the Future," Hous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ptember 14, 2006.

²⁴ 儘管如此，日本的國防力量仍然位居世界前茅。